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外来投资重要吗？*

钟真¹ 余镇涛¹ 白迪²

摘要：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外来资本进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提供了契机。但外来投资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能否如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宣称的那样实现“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效果，是实践探索和理论分析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本文以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为基础，在控制了生产经营特征、本地乡村振兴程度的情况下，对外来投资者比重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主要结果表明，外来投资者比重对村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效益提升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但若剥离本地乡村振兴程度的叠加影响，外来投资者比重的作用将被高估，并且该促进作用与区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这些结论将为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外来投资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经营收益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①快速发展，并逐步成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代表性产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年度报告（2017年）》显示，2017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超过了6200亿元，年接待游客22亿人次，从事休闲农业的人员已经达到900万人，带动了700万农民从中受益。可见，休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政策选择研究”（项目编号：71773134）和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合作研究课题“农村产业融合和乡村旅游发展研究”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但文责自负。

^①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agritourism）是指以农业生产和农村文化为基础的可以吸引观光客、创造新型经济价值的融合型产业，故严格地说它至少是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的结合，但鉴于目前学界对其称谓的“多样化”（如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乡村旅游、农业旅游等），本文采用中国官方（至少是农口部门）在文件中统一使用的概念——“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来指代这一特殊产业。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对于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生态美丽乡村和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胡鞍钢、王蔚，2017）。进一步的经验研究还表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对第一、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牵动”和“促动”效应（宁泽群，2014；袁中许，2013）；对于农户的非农收入增加（Hwang and Lee, 2015）、农民脱贫和可持续生计发展（王彩彩，2018；史玉丁、李建军，2018），以及缓解城乡经济不平衡（Liu et al., 2017）等多个方面均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当然，已有研究也发现新时代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与体制机制障碍。经营模式同质化（周玲强，2018）、专业人才短缺（樊志勇、沈左源，2018）、资源约束增强（于法稳，2017）、体制机制不畅（孟凯等，2018）等问题一直存在，致使某些地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走入了瓶颈期。以北京市为例，2017年全市民俗旅游实际经营户8363户，比上年减少了663户；民俗旅游总收入14.2亿元，比上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此外，观光园的接待人次也比上一年下降了6.45%，经营收入虽上涨了6.93%，但也远不及前五年20%以上的年增长率，并且作为主打项目的采摘收入竟下降了10.8%^①——这种经营收入和接待人次的“双下降”在北京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近三十年历史上尚属首次。

对此，无论是2015年以来的4个中央一号文件，还是国务院办公厅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的四个意见和2018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抑或是各部委单独或联合出台的关于推动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文件，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要调动社会资本，撬动和引导更多外部资源支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很多地方政府更是直接针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出台了招商引资政策。这为大量外来资本进入乡村、涌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提供了机遇。不少国内外研究发现，政府的支持政策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确实能起到积极作用（Fleischer and Felsenstein, 2000）；但是在鼓励外来投资进入的效果上，无论是国内的案例（例如Zhou et al., 2017；Ying and Zhou, 2007；Tang et al., 2007；Zou et al., 2014），还是西班牙、南非、伊朗、澳大利亚等国外案例（例如Sastre, 2002；Mahony and Van Zyl, 2002；Yazdi et al., 2015；Daly et al., 2010）都显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效益的提升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当地社区相关的社会文化、集体行动与非正式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约束。那么，外来投资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是否真的那么重要，它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换言之，外来投资者能否“玩转”当地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其产业发展中是否也存在“外来和尚好念经”的现象？这就需要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厘清影响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科学审视外来投资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关系，方能为新时代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①参见《北京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tj.beijing.gov.cn/tjsj/tjgb/ndgb/201803/P020180302397365111421.pdf>。

二、理论分析

学界关于外来投资在各行业发展中所发挥作用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梳理。这里重点对外来投资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文献综述，并提出本文拟验证的假说。

（一）外来优势：外来投资是否起作用？

目前，“外来者劣势”理论在制造业、商业、金融业等非农产业中被多次证明并已逐步成为共识（蔡灵莎等，2015）。在涉农领域，不少学者也有类似发现。相对于将工人聚集于一个空间内便于管理的工商业而言，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的劳动者常常在广袤的农田、开放的村庄或者采摘观光园内工作，其劳动的速度和质量都无法有效监控（陈锡文，2012；Mann and Dickinson，1978），进而产生“经典”的激励和监督问题（伯恩斯坦，2011）。同时，随着土地租金和雇工成本的走高，外来资本的利润率被快速压缩了，经营者容易陷入财务困境（黄宗智，2012；贺雪峰，2013）。此外，外来资本在利用当地资源要素进行规模化经营时，还经常会面临诸如与当地居民利益分配协调不充分（赵祥云、赵晓峰，2016）、与当地农民或从业者的互动不足（徐宗阳，2016）、与当地社会文化的融合不深入（吴冠岑、许恒周等，2013）等“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是，也有学者从农业转型、产业融合及农业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对外来投资发挥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黄祖辉、王朋，2008；全志辉、温铁军，2009）。因为外来投资不仅能解决农业规模经营中最重要的资金来源问题（徐林强、童逸璇，2018），还能促进农民增收（罗明忠、唐超，2018），优化村落空间布局、生态环境，建立新的村落符号和文化互动（罗秋菊等，2018），改善乡村治理（王敬尧、王承禹，2018）等。

可见，外来投资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中是否具有全方位的“外来优势”，已有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答案。但仅从提升经营效益的角度而言，外来投资者往往较以农户为主的本地经营者具有更为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管理理念、规范的经营手段、完善的运营方式、稳定的客户来源以及优质的经营内容而具有更高的收益水平；并且不同来源的投资在同一区域内部将形成效力各异的综合作用，进而带来区域之间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收益的差异（徐振伟、朱增勇，2018；葛顺奇、罗伟，2011）。可以推断，一个区域内外来投资者比重越高，该区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经营收益就可能越高。大量政策实践也表明，外来投资确实能够在提升经营效益上发挥正面作用。这从各部委、各地方政府频繁出台针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政策的现象可见一斑。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外来投资可以促进同区域内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经营效益。

（二）本地优势：本地乡村振兴程度是否有影响？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扎根于农业农村的融合型产业，是实现农业多功能性价值与游客体验需求多元性精准对接的重要平台，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具有较好的耦合性（蔡克信等，2018），因而它的发展水平必然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从“需求侧”角度看，游客满意度、出游意愿、消费者个体特征、消费动机等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起到了明显的驱动作用，其中需求方对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产品的感知评价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杨军辉等，2018；尹燕、周应恒，2013；唐德荣等，2010）。目前，学术界在这个角度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对衡量当地乡村振兴程度的“供给侧”因素的关注还较为薄弱。事实上，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深入开展，体现“本地优势”的乡村振兴各个维度都影响着当地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经营状况。概括来说，这些维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与生态宜居水平息息相关的，如自然资源、景观特色（Gao et al., 2014）、地方基础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建设情况（Loureiro, 2014）等；二是与乡村治理状况、乡风文明程度密不可分的，如村庄集体行动和组织领导能力（Tang and Claire, 2012）、获得政府干预和政策导向支持（Srisomyong and Meyer, 2015）、存在古村落和文化遗产（Kastenholz et al., 2012）等；三是与该产业规范性、产业融合度、产业兴旺程度紧密联系的，如是否为本地品牌的农产品（Ohe and Kurihara, 2013）、有机农业发展程度（Kuo et al., 2006）、是否为法人单位或是本地人经营等（Komppula, 2014）、要素投入、经营规模和经营策略等（Chen et al., 2013）。可见，关注本地乡村振兴程度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逻辑上看，鉴于出游便利性、舒适性等因素，消费者往往会更青睐于交通卫生条件更好、相关产业融合程度更深、生态环境更宜居、乡风文化更淳朴浓厚的乡村作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目的地（熊剑平，2008）。因而本地乡村振兴程度越高，游客吸引力能力将越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经营收益自然也越高。那么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项目由谁投资经营的意义便会弱化。换言之，外来投资和本地乡村振兴程度都会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经营收益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因此不考虑若干维度上的本地乡村振兴程度，可能会高估外来投资的作用。

进一步地，由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兴旺）的一个重要体现，因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基础将影响外来投资所能发挥作用的大小。文献研究表明，由于资本、信息、理念等因素的“外来性”特征，外来投资者与本地原经营户之间在要素投入、资源获取、文化融合、经营内容等方面是存在差异的，两者间的差异在影响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方面可能将形成挤压效应（张世兵、龙茂兴，2009）。即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外来投资者的“外来性”对其投资收益可能并不明显，甚至会对其生产效率、经营质量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刚刚起步的地区，外来投资的经济效果可能越好（李涛，2018；黄郁成等，2007）。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如果不剥离本地乡村振兴程度的影响，外来投资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的促进作用将会被高估，并且该促进作用与区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三）逻辑框架

综上，本文将综合考察由外来投资带来的“外来优势”和基于本地乡村振兴程度形成的“本地优势”对区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的双重影响。一方面，重点考察在控制了“本地优势”之后，“外来优势”的作用是否会在“挤压效应”的影响之下减弱。另一方面，由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三次产业融合的特殊产业，它的发展不仅将进一步提升本地乡村振兴程度，还将影响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那么“挤压效应”会不会因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进而对外来投资的作用产生显著影响？这是本文要考察的另一个重点。具体逻辑分析框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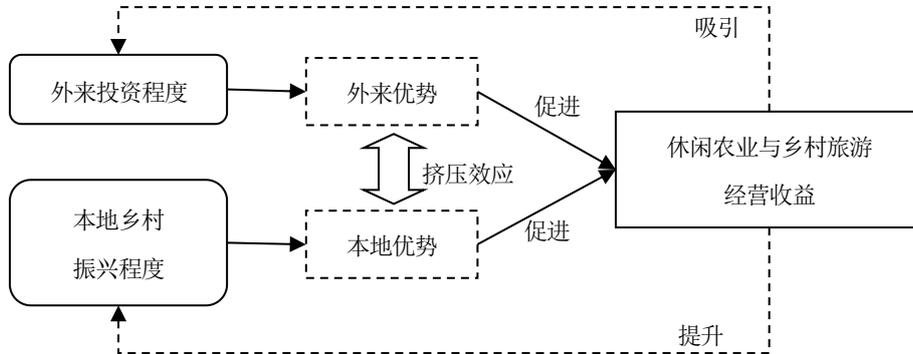


图 1 逻辑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与指标解释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主要来自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以下简称“三农普”）的村级数据。之所以选择北京市作为分析对象，理由有以下三点。一是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和一线特大型城市，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和政策环境支撑，也是中国最早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城市之一，而正如前文所述该产业目前面临的挑战也较为突出。二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是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柱，故北京市“三农普”在全国普查问卷基础上专门设置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调查表，这为本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三是已有研究对北京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内在机制的实证研究还较为薄弱。仅有少数学者或从“需求侧”角度讨论过京郊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在低碳经济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发展的影响因素（例如范子文，2014；何忠伟等，2015），或从“供给侧”角度分析了经营者决策逻辑和产业融合问题（例如王琪延、徐玲，2013；钟真等，2015），但针对外来投资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关系还缺乏深入的定量分析。此外，从经营户的层面看，资本作为投入要素，它是何种来源对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生产经营过程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但从区域层面看，由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的集聚效应和不同投资者在要素共用、客源互通、资源共享、风险分担方面的协同作用，外来投资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溢出效应（杨慧莲等，2017；罗庆、李小建，2010）；为此，本文选择村级数据是较为合适的。经过梳理，本文所用数据一共涉及北京市非城区的 2950 个村级单位。

（二）指标选择与描述分析

1.被解释变量：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本文选取样本村 2016 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经营收入合计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村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之所以不用利润来衡量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营收入是反映经营效益最为直接的指标，二是北京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依然以农户自主经营为主，实际上经营支出往往与农户的个人支出、家庭支出混同，故从统计口径来说，经营利润并不能有效衡量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经营效益。样本数据显示，2016

年全市平均村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收益为 452.09 万元，但约有 42% 的样本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年收益在 50 万元以下，超过 75% 的样本村在 300 万元以下（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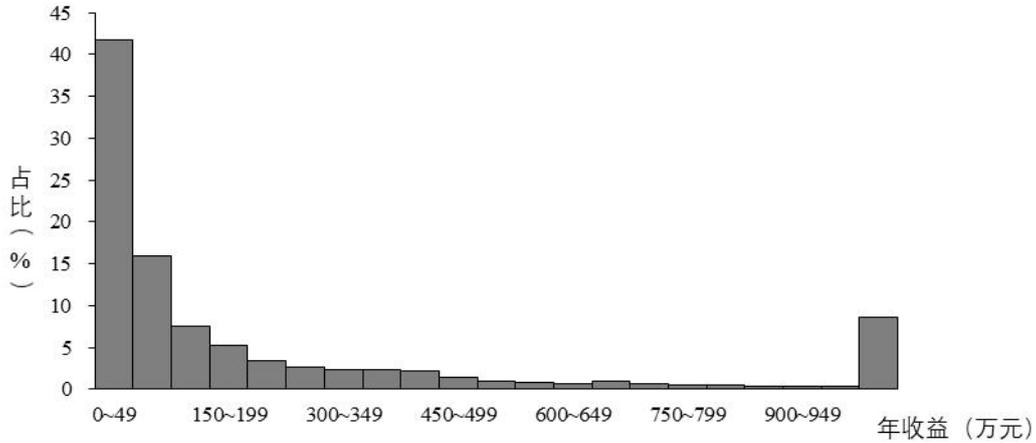


图 2 样本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年收益分布

2.解释变量：村庄外来投资者比重。本文重点是在区域层面考察“外来和尚是否好念经”，故主要关注村庄范围内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地域属性及其构成。为此，本文选择样本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者中非京籍的占比来衡量，而不是村庄非京籍经营者的投资规模或其比重。主要理由是，一方面北京市“三农普”数据并没有提供 2016 年当年的投资规模；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资本本身是“中立”的，作为投入要素而言，投资规模大小并不能直接反映投资者身份及其在村庄中的构成。从样本村的数据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或项目）有 73.90% 由本乡镇人投资经营，乡（镇）外（北京）市内人经营的占比为 5.73%，由市外及国际、港澳台人投资经营的占比为 20.37%（见图 3）。进一步地，考虑到近年来北京市城乡一体化深入推进和各区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的协调融合发展，使得乡外市内投资者的“外来属性”相对较小，故而本文以市为界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者划分为京内投资者与京外投资者两类。从经营效益上看，无论是从年平均经营收入还是成本利润率来看，京外投资者的经营表现均优于京内投资者；这初步说明外来投资与经营收益很可能呈现正相关关系（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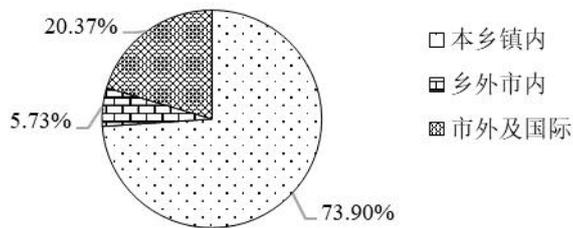


图 3 样本村经营者地域属性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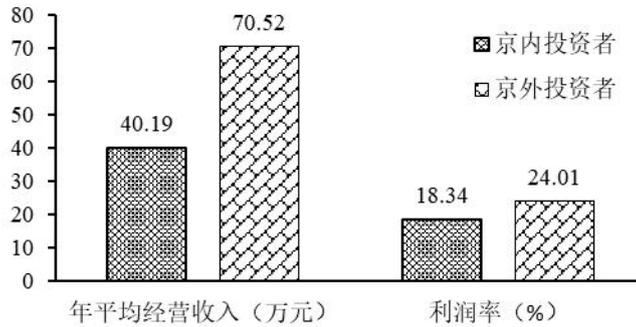


图4 京内外投资与经营收益的关系

3.控制变量：生产经营特征与本地乡村振兴程度。为了更加准确地衡量外来投资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的“内”“外”两个层面来选择控制变量（赵磊等，2013；李静，2017）：对“内”重点控制村级层面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生产经营特征，对“外”重点控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外部条件——本地乡村振兴程度。其中，生产经营特征主要从要素投入和经营方式的角度，选取了经营用地面积、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投入、投资规模和组织化程度等五个指标。本地乡村振兴程度主要按照十九大提出的“20字方针”，选取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个维度23个指标。其中，产业兴旺维度主要从产业关联度的视角出发，选取了全村农业用地面积、餐馆数量、商超数量、是否有电子商务配送点等指标；生态宜居维度主要基于居住的便利性、舒适性方面考虑，选取了进村和村内道路、路灯、公共交通、村庄绿化程度、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数量、饮用水及污水处理情况、地理地貌；乡风文明维度主要从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的角度，选取了农民业余文化组织个数、体育设施、图书文化室、卫生室个数等指标^①；治理有效维度则主要选取了村两委任职特点和样本村乡村治理水平^②两个指标；生活富裕维度则选取了样本村集体收入、集体负债、农网升级改造情况、清洁能源供暖的使用户数等指标。

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赋值及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	样本村2016年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入合计	452.09	1881.23

^①之所以把“卫生室个数”放在乡风文明维度主要是由于卫生室在村庄中不仅承担了村庄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功能，也常常是作为村庄社会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此外，这样划分也并不影响模型本身的估计结果。

^②样本村“乡村治理水平”是根据“是否有村庄规划”“是否有村规民约”“是否进行村务公开”“是否有村务监督委员会”和“是否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5个具体指标综合判定。若样本村满足上述5个指标，则评定为乡村治理水平较高；满足其中任意3~4个，则评定为乡村治理水平中等；同理，若只符合1~2个指标，则表明样本村乡村治理水平较低。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外来投资重要吗？

(Agritourism)		(万元)		
外来投资者比重 (Invest)		样本村非京籍投资者占比 (%)	20.37	32.35
生产经营特征 (Input)	经营用地面积	该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用地面积 (亩)	233.57	1633.62
	受教育程度	经营者受过高等教育占比 (%)	12.68	24.52
	劳动力投入	长期从事该行业的人员 (个)	33.82	87.31
	投资规模	样本村经营户注册资金总额 (万元)	676.28	5763.06
	组织化程度	样本村团体、法人经营的占比 (%)	17.98	31.05
产业兴旺维度 (Industry)	农业规模	全村农业用地面积 (亩)	3711.05	7333.57
	餐馆数量	有执照的餐馆个数 (个)	3.30	9.89
	商超数量	营业面积 50 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个数 (个)	2.27	3.00
	电子商务	是否有电子商务配送点 (是=1, 否=0)	0.49	0.500
生态宜居维度 (Reside)	进村道路	进村道路是否有大面积损毁 (有=0, 无=1)	0.67	0.47
	村内道路	村内道路是否有大面积损毁 (有=0, 无=1)	0.56	0.50
	路灯条件	村内主要道路是否有路灯 (有=1, 无=0)	0.99	0.07
	公共交通	是否通公共交通 (是=1, 否=0)	0.97	0.18
	村庄绿化	样本村村庄绿化面积 (亩)	312.54	988.54
	垃圾收集点	样本村垃圾收集点的个数 (个)	7.75	14.31
	饮用水处理	饮用水是否集中净化处理 (是=1, 否=0)	0.99	0.11
	污水管网	是否有生活污水管网 (是=1, 否=0)	0.47	0.50
	地形地貌	样本村所处地的地形地貌 (平原=1, 山区=0)	0.68	0.47
乡风文明维度 (Culture)	文化组织	农民业余文化组织个数 (个)	0.72	0.92
	体育场所	样本村体育健身场所个数 (个)	1.37	1.15
	图书文化室	样本村图书室、文化站个数 (个)	0.96	0.28
	卫生室	样本村卫生室个数 (个)	0.96	0.80
治理有效维度 (Governance)	村两委任职特点	党支部书记是否兼任村委会主任 (是=0, 否=1)	0.40	0.49
	乡村治理水平	样本村乡村治理水平 (高=3, 中=2, 低=1)	2.74	0.45
生活富裕维度 (Life)	村集体收入	样本村村集体收入 (万元)	988.95	7835.99
	村集体负债	样本村村集体负债 (万元)	3930.41	23111.15
	农网升级改造	实施农网升级改造的自然村、居民定居点个数 (个)	0.60	1.02
	清洁能源使用	清洁能源供暖的户数 (户)	161.32	456.05

四、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定

为考察村庄外来投资者比重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收入之间的量化关系，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n Agritourism = \beta_0 + \beta_1 Investment + \beta_{2i} Input_i + \beta_{3i} Industry_i + \beta_{4i} Reside_i + \beta_{5i} Culture_i + \beta_{6i} Governance_i + \beta_{7i} Life_i + \mu \quad (1)$$

(1) 式中， β_0 为常数， β_1 表示外来投资者比重指标的回归系数， β_{2i} 为若干生产经营特征的回归系数； β_{3i} 、 β_{4i} 、 β_{5i} 、 β_{6i} 、 β_{7i} 分别为产业兴旺维度、生态宜居维度、乡风文明维度、治理有效维度和生活富裕维度的相关回归系数； μ 代表随机干扰项。

根据理论分析的推断，无论是外来投资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还是“本地优势”对“外来优势”形成的“挤压效应”，都很有可能会因不同村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而经典 OLS 回归的估计结果存在均值意义上的局限性，无法很好呈现各类因素对不同经营收益层次的村庄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具体影响。对此，学界常见的处理方式是采用分位数回归、分组回归、半参数分析法或局部线性匹配法等计量方法（刘晗、王钊，2017；张永丽、梁顺强，2018）。考虑到本文数据特点，本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来考察不同村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异质性的影响。该方法将条件分位数与回归方法相结合，假设给定 $y|x$ 的总体 q 分位数 $y_q(x)$ 是 x 的线性函数。于是，本文又进一步建立如下分位数回归模型：

$$Y_q(X_i) = \alpha_q + X_i \beta_q \quad (2)$$

(2) 式中， β_q 为“ q 分位数回归系数”， X_i 为方程中的第 i 个解释变量。本文分别选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的 3 个四分位数的回归结果，将其划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以此来揭示各个解释变量对不同经营收入分布段的影响程度。

(二) 结果分析

本研究所有的检验及回归是在 Stata14 软件操作下完成的。在回归时，本文首先考虑了关键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村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对该村非京籍投资者占比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外来投资者可能会选择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高的村，但也可能因为竞争压力而更愿意选择发展水平较低的村，故因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与外来投资者比重之间互为因果造成的内生性可能并不严重；另一方面，考察是否存在遗漏变量问题的 Ramsey 检验结果表明（检验的 P 值为 0.374），模型遗漏重要变量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故综合来看本研究中关键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并不严重，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其次，为了减少异方差带来的影响和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稳健回归，并在回归之前对部分变量作了取对数处理。在对进入模型的自变量进行 Spearman 检验时，发现自变量中相关性最大的两个变量，其相关系数为 0.70；并且平均的方差膨胀因子（Mean VIF）值为 1.23，最大的也仅为 1.89^①。这些结果表明尽管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但问题并不严重。此外，稳健回归 II 的 R 方值为 0.631，F 值为 155.16，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分位数回归的 R 方值分别为 0.375、0.411、0.445，回归方程和结果整体是可接受的（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3 和表

^①限于篇幅，本文不具体报告 Spearman 检验矩阵和 VIF 结果，有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4)。

1. 稳健回归分析。(1) 关于外来投资者比重的作用。从稳健回归 I 的估计结果看，在仅控制了生产经营投入要素的影响之后，样本村非京籍投资者占比每增加 1%，样本村经营收入合计则增加 0.736%，说明外来投资者比重确实会促进样本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入的增加。但正如前述逻辑，本地乡村振兴程度同样会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有较强的正向效果，模型 I 的结果并没有将这部分“增收效应”予以剥离，因而不能有效说明外来投资者比重的真实作用。对此，稳健回归 II 将本地乡村振兴程度进一步纳入估计，结果显示：样本村非京籍投资者占比每增加 1%，样本村经营收入合计则增加 0.398%，该作用比前者缩小了近 50%。这说明，若不控制本地乡村振兴程度的影响，外来投资者比重对样本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的实际促进效果将被大大高估。

表 3 稳健回归结果

		稳健回归 I		稳健回归 II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外来投资者比重		0.736***	0.068	0.398***	0.068
生产经营特征	经营用地面积	0.150***	0.010	0.158***	0.012
	受教育程度	0.020	0.100	-0.005	0.118
	劳动力投入	0.005***	0.000	0.004***	0.001
	投资规模	0.376***	0.014	0.338***	0.019
	组织化程度	-0.031	0.082	-0.055	0.089
产业兴旺维度	农业规模	—	—	-0.032*	0.017
	餐馆数量	—	—	0.011***	0.002
	商超数量	—	—	0.043***	0.011
	电子商务	—	—	0.112***	0.042
生态宜居维度	进村道路	—	—	0.204***	0.063
	村内道路	—	—	-0.033	0.059
	路灯条件	—	—	0.313	0.366
	公共交通	—	—	0.375**	0.152
	村庄绿化	—	—	0.037***	0.010
	垃圾收集点	—	—	0.001	0.001
	饮用水处理	—	—	-0.184	0.211
	污水管网	—	—	0.109**	0.046
地形地貌	—	—	0.097	0.061	
乡风文明维度	文化组织	—	—	0.017	0.021
	体育场所	—	—	0.016	0.016
	图书文化室	—	—	-0.092	0.071
	卫生室	—	—	0.082***	0.026
治理有效维度	村两委任职特点	—	—	-0.014	0.046
	乡村治理水平	—	—	0.043	0.049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外来投资重要吗？

生活富裕维度	村集体收入	—	—	0.038**	0.017
	村集体负债	—	—	0.051***	0.013
	农网升级改造	—	—	0.078***	0.020
	清洁能源使用	—	—	-0.000	0.000
样本量		2950		2950	
R ²		0.590		0.631	
F 值		704.94***		155.16***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2) 关于生产经营特征的影响。稳健回归 II 的结果显示，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投入每提高 1 个百分点，样本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分别会增加 0.158%、0.004%、0.338%。这说明要素投入依然是样本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其中，投资规模的边际作用最大，几乎与外来投资程度旗鼓相当。可以推断，若各类要素投入能够自给自足，那么在不考虑本地乡村振兴程度的情况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由谁来投资经营的意义就将大大减弱，即外来投资的“外来优势”势必式微。当然，与土地、资金投入相比，劳动力投入的作用要小得多，说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并非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此外，经营者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组织化的经营方式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与北京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仍旧是小微规模的农户自主经营方式为主有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自经营者能力或创意等个体因素的作用尚未成为当前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主要驱动，而产业整体投入和所处外部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

(3) 关于本地乡村振兴程度的影响。前述理论分析和部分计量结果的推断已经表明，本地乡村振兴程度确实是影响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所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产业兴旺维度中，样本村农业规模、餐馆数量、商超数量和有电子商务配送点等因素与该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庄的经营收入比没有的平均高出 0.112%。在生态宜居维度中，进村道路、公共交通、村庄绿化面积和生活污水处理对样本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收入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进村道路没有损毁和开通公共交通的村庄的经营收入相对分别要高出 0.204 和 0.375 个百分点，进行生活污水处理的村庄的经营收入也要高出 0.109 个百分点；这说明直接影响游客感官的那些与“路”和“水”相关的村庄硬件设施，依然是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乡风文明维度中，除了卫生室个数具有较小的正向影响之外，文化体育设施对村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治理有效维度中，衡量村集体领导班子“战斗力”的村两委交叉任职现象和衡量村庄整体治理程度的“乡村治理水平”两个指标均不显著。这说明体现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的主要因素尚未对村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构成重要影响，这与当前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相关产品与农村文化、村庄治理的结合度还比较低有关。在生活富裕维度中，除了清洁能源使用户数之外，村集体收入、村集体负债、实施农网升级改造的自然村或居民定居点个数均对样本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村庄集体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相关的因素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总体上是

积极的。

2.分位数回归分析。(1)关于外来投资者比重的作用。从Q1~Q3三个分位数回归的结果看,样本村非京籍投资者占比对该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的影响均十分显著,但其系数逐步减小,分别为0.387、0.285和0.207。进一步对三个分位数回归中外来投资的系数是否相等的T检验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三个系数不完全相等。这表明,外来投资者比重的作用会随着样本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的提高而减弱。即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越高的村庄(以下简称“高水平村庄”),外来投资者越多对该产业的作用相对越小;而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或刚刚起步的村庄(以下简称“低水平村庄”),外来投资者越多经济效果反而越好。可见,“外来和尚好念经”也是有条件的,这种现象多存在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而在那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程度已经达到较高层次的区域而言,引入更多的外来投资者未必能发挥较高的预期效果。

表4 分位数回归结果

		Q1		Q2		Q3	
		低水平村庄		中等水平村庄		高水平村庄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外来投资者比重		0.387***	0.079	0.285***	0.064	0.207***	0.081
生产经营特征	经营用地面积	0.143***	0.015	0.147***	0.013	0.156***	0.015
	受教育程度	-0.176	0.125	0.101	0.138	0.214	0.178
	劳动力投入	0.003***	0.001	0.005***	0.001	0.006***	0.001
	投资规模	0.392***	0.022	0.359***	0.018	0.320***	0.025
	组织化程度	0.091	0.090	-0.027	0.104	-0.210	0.132
产业兴旺维度	农业规模	-0.018	0.020	-0.027	0.019	-0.052***	0.019
	餐馆数量	0.015***	0.003	0.008***	0.002	0.007**	0.004
	商超数量	0.046***	0.012	0.048***	0.013	0.070***	0.017
	电子商务	0.116**	0.045	0.130***	0.033	0.066	0.051
生态宜居维度	进村道路	0.304****	0.075	0.211***	0.072	0.160**	0.072
	村内道路	-0.070	0.084	-0.019	0.060	-0.049	0.076
	路灯条件	0.117	1.113	-0.014	0.409	0.340	0.310
	公共交通	0.447*	0.231	0.210	0.132	0.457***	0.118
	村庄绿化	0.029*	0.016	0.042***	0.011	0.047***	0.014
	垃圾收集点	-0.000	0.002	0.001	0.002	0.001	0.003
	饮用水处理	-0.580	0.425	-0.343	0.274	-0.236	0.156
	污水管网	0.158*	0.084	0.081*	0.047	0.052	0.048
地形地貌	0.190**	0.917	0.063	0.074	-0.122	0.083	
乡风文明维度	文化组织	0.022	0.030	0.014	0.022	-0.018	0.032
	体育场所	0.018	0.023	0.010	0.022	0.019	0.015
	图书文化室	0.190*	0.102	-0.026	0.098	-0.048	0.102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外来投资重要吗？

	卫生室	0.082**	0.039	0.082**	0.033	0.047	0.030
治理有效 维度	村两委任职特点	-0.048	0.083	-0.006	0.048	0.002	0.063
	乡村治理水平	-0.020	0.065	-0.002	0.047	0.037	0.053
生活富裕 维度	村集体收入	0.072***	0.021	0.036*	0.022	0.030	0.021
	村集体负债	0.018	0.014	0.042***	0.012	0.059***	0.016
	农网升级改造	0.085***	0.027	0.088***	0.031	0.040	0.034
	清洁能源使用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2950		2950		2950	
伪 R ²		0.375		0.411		0.445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

(2) 关于生产经营特征的影响。三个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土地、劳动、资本三大要素投入的系数依然显著；但是 T 检验的结果表明，随着样本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土地和资本投入的作用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而劳动力投入的作用（尽管很小）却显著提高。这说明，尽管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并非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它的发展繁荣依然是解决农民就业的有效途径之一。

(3) 关于本地乡村振兴程度的影响。对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程度不同的村庄而言，本地乡村振兴的五个维度 23 个因素的回归系数在显著性方面与稳健回归的结果略有变化，但是在系数大小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在产业兴旺维度中，农业规模对高水平村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于中低水平的村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以种植业为代表的农业规模越大，高水平村庄对休闲旅游等非农用地的利用将越受到限制；餐馆数量对低水平村庄作用更大，而商超数量则相反，可能是因为低水平村庄多处于人气集聚阶段，餐饮则常常是吸引游客门槛较低的手段，而对于已经形成品牌或知名度的高水平村庄，特色农产品或文创产品则成了其重要的创收来源；是否有电子商务配送点对于中低水平村庄作用明显，而对高水平村庄则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高水平村庄绝大多数已经具备快捷便利的物流配送和在线预订网络，各类设施设备相对完善，已经能够较好满足游客需求，而低水平村庄则相反。在生态宜居维度中，进村道路是否完好和是否具备污水管网两个指标均对低水平村庄具有更大的作用，原因在于低水平村庄常常连基本的硬件设施都不完善，进而影响了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经营收入；是否开通公共交通对于低水平和高水平的村庄同时具有类似的正向影响，而对中等水平村庄则影响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绝大多数村庄都已经开通公共交通，因而公交带动的游客数量对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的影响相对于高低两端的村庄而言更不敏感；村庄绿化的作用则随着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这也是为什么越是高水平的村庄常常具有更好的绿化或生态景观设置；所处地形地貌为平原对于低水平村庄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具有明显作用，但对中等水平和高水平村庄的作用并不明显，原因主要在于北京市的平原区主要在城市近郊，而近郊区在硬件条件上更容易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事实上大多数低水平村庄也集聚于此，而高水平村庄大多在山区或半山区。在乡风文明维度中，除了稳健回归中影响显著的卫生室个数这一指标对低水平和中等水平村庄依然显著外，图书文化室数量也

仅对低水平村庄具有显著作用，其他指标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卫生文化设施在北京市农村已经全面普及，而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并没有同农村文化深度结合的情况下，它们对高水平村庄的影响自然不明显。在治理有效维度中，两个代理指标依然没有在不同发展程度的村庄之间产生新的不同结果。在生活富裕维度中，村集体收入和农网改造程度对于中低水平村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高水平村庄的影响不显著；村集体债务则相反，它对中高水平村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低水平村庄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高水平村庄的集体收入和农网改造程度本就达到了较高水平，其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的边际作用已经不明显了，而村级债务常常体现的是村庄通过自我举债开展的非政府普惠式的特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的规模或程度，这对于高水平村庄的经营户而言可谓“如虎添翼”，而对低水平村庄而言反而过早地增加了负担。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当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重要形式，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期。而以吸引外部投资进入为主要手段的“招商引资”策略能否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中实现“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效果，是实践探索和理论分析的焦点之一。为此，本文以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为基础，对外来投资者比重、本地乡村振兴程度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点：一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外来投资者比重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效益提升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若不剥离本地乡村振兴程度的叠加影响，外来投资者比重的作用将被高估。二是，外来投资者比重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效益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村庄的作用总体上大于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三是，要素投入等生产经营特征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四个维度的本地乡村振兴程度的若干指标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其影响会随着村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差异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上述结论可以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方面，外来投资与本地乡村振兴程度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各具优势，即“依靠外力”与“练好内功”同等重要，在制定相应支持政策时不应偏废。尤其是过度重视外来投资对于那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已经较高的村庄而言将可能得不偿失。因而有必要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实现“外来优势”和“本地优势”的互补，方是提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的合理做法。另一方面，针对由不同发展层次形成的村庄异质性，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支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村庄或区域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对于大多数处于起步阶段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较低的村庄而言，重视外来投资的同时，应注意尽快完善村庄道路、污水处理、互联网设施等硬件配套建设；而对于已经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益较好的村庄，应适当弱化对“招商引资”的关注，而更加重视本地农业发展规模、商超开设数量、绿化面积、非普惠式特色基础设施建设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协同配合。

参考文献

- 1.蔡克信、杨红、马作珍莫, 2018:《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路径选择》,《农村经济》第9期。
- 2.蔡灵莎、杜晓君、史艳华、齐朝顺, 2015:《外来者劣势、组织学习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研究》,《管理科学》第4期。
- 3.陈锡文, 2012:《把握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经营形式和农村社会形态变迁的脉搏》,《开放时代》第3期。
- 4.樊志勇、沈左源, 2018:《以供给侧改革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人民论坛》第9期。
- 5.范子文, 2014:《北京休闲农业升级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 6.葛顺奇、罗伟, 2011:《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基于模仿与创新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第1期。
- 7.何忠伟、陈艳芬、罗红, 2015:《低碳经济背景下北京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8.贺雪峰, 2013:《小农立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9.亨利·伯恩斯坦(英), 2011:《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汪淳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0.胡鞍钢、王蔚, 2017:《乡村旅游:从农业到服务业的跨越之路》,《理论探索》第4期。
- 11.黄郁成、张国平、李金波, 2007:《乡村旅游投资主体关系研究》,《旅游学刊》第22卷第6期。
- 12.黄宗智, 2012:《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开放时代》第3期。
- 13.黄祖辉、王朋, 2008:《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 14.李静, 2017:《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管理世界》第6期。
- 15.李凝, 2014:《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制度距离的视角》,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 16.李涛, 2018:《中国乡村旅游投资发展过程及其主体特征演化》,《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 17.刘晗、王钊, 2017:《农户生产分工差别化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种植业调查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第5期。
- 18.罗明忠、唐超, 2018:《农地确权:模式选择、生成逻辑及制度约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19.罗庆、李小建, 2010:《基于共生理论的农户群发展研究:以河南省孟寨村农户群为例》,《经济经纬》第2期。
- 20.罗秋菊、冯敏妍、蔡颖颖, 2018:《旅游发展背景下民居客栈的空间生产——以大理双廊为例》,《地理科学》第6期。
- 21.孟凯、李佳宾、陈险峰、范士陈、娄晨曦, 2018:《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公地悲剧”的演化与治理》,《旅游学刊》第8期。
- 22.宁泽群, 2014:《农业产业转型与乡村旅游发展:一个乡村案例的剖析》,旅游教育出版社。
- 23.史玉丁、李建军, 2018:《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旅游学刊》第2期。
- 24.唐德荣、杨锦秀、刘艺梅, 2010:《乡村旅游者重游决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重庆市510位城市游客的调查数据》,《农业技术经济》第7期。
- 25.仝志辉、温铁军, 2009:《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开放时代》第4期。
- 26.王彩彩, 2018:《京津冀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数字脱贫机制》,《社会科学家》第9期。

- 27.王敬尧、王承禹, 2018:《农地制度改革中的村治结构变迁》,《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28.王琪延、徐玲, 2013:《基于产业关联视角的北京旅游业与农业融合研究》,《旅游学刊》第28卷第8期。
- 29.吴冠岑、牛星、许恒周, 2013:《乡村旅游开发中土地流转风险的产生机理与管理工具》,《农业经济问题》第4期。
- 30.吴晓骁、苏勤、姜辽, 2015:《旅游商业化影响下的古镇居住空间变迁研究:以周庄为例》,《旅游学刊》第7期。
- 31.熊剑平、刘承良、颜琪, 2008:《城郊农村居民对乡村旅游感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武汉市黄陂区明清古街为例》,《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 32.徐林强、童逸璇, 2018:《各类资本投资乡村旅游的浙江实践》,《旅游学刊》第7期。
- 33.徐振伟、朱增勇, 2018:《非洲的新圈地运动及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启示》,《教学与研究》第5期。
- 34.徐宗阳, 2016:《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 35.杨慧莲、郑风田、韩旭东、孔玮, 2017:《如何唤醒“沉睡资源”助力村庄发展——贵州省六盘水舍烹村“三变”案例观察》,《贵州社会科学》第12期。
- 36.杨军辉、潘秋玲、徐冬平, 2018:《村寨型乡村旅游地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与机制研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资源开发与市场》第3期。
- 37.尹燕、周应恒, 2013:《不同乡村旅游地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地区》,《旅游科学》第6期。
- 38.于法稳, 2017:《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因、问题及政策建议》,《企业经济》第8期。
- 39.袁中许, 2013:《乡村旅游与大农业耦合的动力效应及发展趋向》,《旅游学刊》第5期。
- 40.张世兵、龙茂兴, 2009:《乡村旅游中社区与旅游投资商合作的博弈分析》,《农业经济问题》第30卷第4期。
- 41.张永丽、梁顺强, 2018:《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3期。
- 42.赵磊、全华, 2013:《外部性、市场潜能与旅游业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财贸经济》第34卷第2期。
- 43.赵祥云、赵晓峰, 2016:《资本下乡真的能促进“三农”发展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44.钟真、谭玥琳、刘伊慧, 2015:《观光农业经营策略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京郊农业经营户应对成本上升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第1期。
- 45.周玲强, 2018:《中国旅游发展笔谈——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旅游学刊》第7期。
- 46.Chen, L. C., S. P. Lin, and C. Kuo, 2013, “Rural Tourism: Marketing Strategies for the Bed and Breakfast Industry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32 (1): 278-286.
- 47.Daly, M. T., R. J. Stimson, and O. Jenkins, 2010, “Tourism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Trends,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Geographical Research*, 34(2): 169-184.
- 48.Fleischer, A., and D. Felsenstein, 2000, “Support for Rural Tourism: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7(4): 1007-1024.

49.Gao, J., C. Barbieri, and C. Valdivia, 2014, “Agricultural Landscape Preferences: Implications for Agritourism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53 (3): 366-380.

50.Hwang, J., and S. Lee, 2015, “The Effect of the Rural Tourism Policy on Non-Farm Income in South Korea”, *Tourism Management*, 46(1): 501-513.

51.Kastenholz, E., M. J. Carneiro, C. P. Marques, and J. Lima, 2012, “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the Rural Tourism Experience — the Case of a Historical Village in Portugal”,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4(3): 207-215.

52.Komppula, R., 2014, “The Role of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ness for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 a Case Study”, *Tourism Management*, 40 (1): 361-371.

53.Kuo, N., Y. Chen, and C. Huang, 2006, “Linkages between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Agro-Ecotourism”, *Renewable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 21(4): 238-244.

54.Liu, J., P. Nijkamp, and D. Lin, 2017, “Urban-Rural Imbalance and Tourism-Led Growth in Chin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64(3): 24-36.

55.Loureiro, S. M. C., 2014, “The Role of the Rural Tourism Experience Economy in Place Attachment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40 (5): 1-9.

56.Mahony, K., and J. Van Zyl, 2002, “The Impacts of Tourism Investment on Rural Communities: Three Case Studies in South Africa”,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19(1): 83-103.

57.Mann, S. A., and J. M. Dickinson, 1978,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ist Agricultur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05(4) :466-481.

58.Ohe, Y., and S. Kurihara, 2013, “Evaluating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Brand Farm Products and Rural Tourism: Evidence from Japan”, *Tourism Management*, 35 (4) : 278-283.

59.Sastre, J. L., 2002, “Tourism Revenues and Residential Foreign Investment Flows in Spain: a Simultaneous Model”, *Applied Economics*, 34(11): 1399-1410.

60.Srisomyong, N., and D. Meyer, 2015,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tourism Initiatives in Thailand”,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41(5): 95-109.

61.Tang, H., and J. E. Claire, 2012, “Local Leadership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Adventa, Monmouthshire”,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4(3): 28-36.

62.Tang, S., E.A. Selvanathan, and S. Selvanathan, 200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ouris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Tourism Economics*, 13(1): 25-39.

63.Yazdi, S.K., K. H. Salehi, and M. Soheilzad,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Iran”,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 1-12.

64.Ying, T., and Y. Zhou, 2007, “Community, Governments and External Capitals in China's Rural Cultural Tour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Adjacent Villages”, *Tourism Management*, 28(1): 96-107.

65.Zhou, L., E. Chan, and H. Song, 2017,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Mobility in Early-S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from Rural China”, *Tourism Management*, 63(6): 338-350.

66.Zou, T., S. Huang, and P. Ding, 2014, “Toward a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 Model of Rural Touris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16(3): 261-271.

（作者单位：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²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投资事业部）

（责任编辑：午 言）

China Agri-tourism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External Investment Important?

Zhong Zhen Yu Zhentao Bai Di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external investment to enter the agri-tourism industry. However, the key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in practice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is how big a role external investment can play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tourism, and whether it can achieve the effect of “Monks from faraway chant the sutras more easily” as claimed by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Third National Agricultural Census of Beijing, this article makes an in-depth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investment and the operating income of agri-tourism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ontrolling relevant variables such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the degree of local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main results show that external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efficiency of village-level agri-tourism, but without stripping the superimposed influence of local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effect of external investment will be overestimated, and the promoting effec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egional agri-tourism. These conclusions will provide beneficial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Key Words: External Investment; Agri-tourism; Operating Revenue; Rural Revitalization